

学林

← (上接3版)

本完备,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们研读经典,频开讲筵,结集编书,抄录汉籍,汉文化蔚为风气,汉文著者泱泱辈出,各类汉文著述琳琅满目。这些无疑就是中华先进文明在彼岸结出的累累硕果。

我们来浏览一下日本的汉文化发展史。

在日本,中国文化的展开在飞鸟、奈良时期,而其成长、成熟、分化及衰微则在平安时期。从桓武天皇延历十二年(794)迁都平安京(今京都市中央部)至文治元年(1185)源赖朝在镰仓(今神奈川县镰仓市)开幕府为止的历史时期,史称平安时期。学者把这个大约四百年的历史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又分为两段:自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794)至嵯峨天皇弘仁、仁明天皇承和(810-848)间,是为“成长期”;清和天皇贞观至宇多天皇宽平(859-898)是为“圆熟黄金期”。有的学者把前期称为“弘仁、贞观文化”,著名的日本文学史家小岛宪之则把它称为“国风暗黑时代”。十世纪起,日本迎来了藤原氏北家为代表的摄关政治和国风文化渐渐兴盛的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史则步入学者所说的中、后期;自十世纪前半的醍醐天皇延喜、村上天皇天历(901-957)年间至十一世纪初的一条天皇长保、宽弘(999-1012)年间,是为中兴、分化期;自十一世纪后半、后冷泉天皇天喜、康平(1053-1065)始,经堀河天皇宽治后之院政期,至十二世纪后半的高仓天皇治承、安德天皇寿永(1177-1185),是为“斜阳期”。

日本汉文化发展史的分期正好比笔者上述的汉籍东传史的分期晚一个“单位时期”:八世纪的奈良时期,汉籍东传史正值“日方中天”的时候,日本汉文化则处于开始兴起的时期;到了九世纪的平安前期,当东传史步入“斜阳西移”的时候,日本汉文化才进入“成长期”、“圆熟黄金期”。汉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而汉籍则是汉文化的物质性的书面载体,前者比后者晚一个“单位时期”不难理解。

不妨看看主要的汉文著作。

属法家类的,有:天长十年(833),清原夏野等奉淳和天皇之勅撰成《养老令》的注释书《令义解》十卷;清和天皇贞观二年(860)左右,惟宗直本撰撰第二部《养老令》的注释书《令集解》五十卷;醍醐天皇延长五年(927),藤原时平、藤原忠平等奉敕撰成《延喜式》。

属史书类的,有:仁明天皇



→ 《倭汉朗咏集》

← 《秘府略》千卷,引书竟达一千五百余种。

承和七年(840),藤原绪嗣等奉敕撰进《六国史》之三《日本后纪》四十卷;清和天皇贞观十一年(869),藤原良房等奉敕撰进《六国史》之四《续日本后纪》二十卷;阳成天皇元庆三年(879),藤原基经等奉敕撰进《六国史》之五、日本第一部汉文实录体史书《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十卷;宇多天皇宽平四年(892)五月,菅原道真等奉敕撰进《类聚国史》二百卷、目录二卷、《帝王系图》三卷;醍醐天皇延喜元年(901),藤原时平等奉敕撰进《六国史》之六、《日本三代实录》五十卷。

属小学、类书类的,有:空海于淳和天皇天长七年(830)编纂了日本现存最早的辞书《篆隶万象名义》三十卷,解释一万六千个汉字的音义;天长八年(831),滋野贞主等又编成大型汉籍类书《秘府略》一千卷;菅原是善于阳城天皇元庆四年(880)以前撰成《东宫切韵》二十卷;僧昌住在醍醐天皇昌泰年间(898-901)撰成日本最早的汉和辞书《新撰字镜》十二卷;源顺于朱雀天皇承平四年(934)左右编成日本第一部汉和百科辞书《和名类聚抄》(倭名类聚抄)。

属医家类的,有:深根辅仁于延喜年间(901-923)撰进的日本最早的汉和药名辞书《本草和名》;丹波康赖于圆融天皇永观二年(984)奏上的日本最

早的医书《医心方》三十卷。

属汉诗文集类的,总集类有:嵯峨天皇即位不久,弘仁五年(814),小野岑守等奉敕编成日本第一部汉诗集《凌云新集》。五年后,弘仁九年(818),藤原冬嗣等奉敕编成第二部汉诗集《文华秀丽集》。淳和天皇天长四年(827),滋野贞主等又奉敕编成第三部汉诗文集《经国集》。此外,选集类有成书于醍醐天皇延长年间(925-929)、今存最早的汉诗诗句专门选本、大江维时所编《千载佳句》,一条天皇时(986-1010)藤原公任编选的《和汉朗咏集》。别集类则有:成书于元庆四年(880)的都良香《都氏文集》,成书于宽平三年(891)的岛田忠臣《田氏家集》,成书于延喜年间的纪长谷雄《纪家集》,成书于昌泰三年(900)的菅原道真《菅家文草》和成书于醍醐天皇延喜二年(903)的《菅家后集》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例举的、涉及各学科领域的著述,具有四个显著的特点:

一、多“日本最早”、“日本第一部”。这既反映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又标志着它的成熟。

二、多“敕编”。嵯峨天皇《凌云集序》引曹丕《典论·论文》“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经国集》之取名亦出于此,生动地说明繁荣、成熟的学术文化的局面是在帝王的提倡下出现的。

三、大都引载富赡、卷帙巨大。《秘府略》千卷,引书竟达一千五百余种;《篆隶万象名义》释字一万六千;《新撰字镜》收字约两万一千;《和名类聚抄》(二十卷本)收词三千三百,引书四百七十五种;《本草和名》收载药物一千〇二十五品;《医心方》引书百余种。

四、这些著述几乎都带有归纳、总结、集成、网罗的性质。惟宗直本的《令集解》是一部当时有关律令条文各种文献的集释。十世纪的最后一部格式《延喜式》,是日本的政治体制从律令国家向前期王朝国家转型的标志。《日本后纪》等正史,在“六国史”中占了四部,都是纵贯数朝历史的记载。菅原道真的《类聚国史》,类似中国《会要》体史书,据《日本书纪》等五部编年体国史归纳综合改编而成。《东宫切韵》集陆法言等十三家《切韵》之大成。《凌云新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所谓敕编三汉诗文集,其中《经国集》不仅收录范围追溯到飞鸟时期文武天皇庆云四年(707),多达一百七十八人、一千零二十三首,文体包括赋、诗、序、策文等,还例外地收录了空海的诗作,可谓飞鸟、奈良、平安前期的优秀作品的大汇集。《千载佳句》采收唐代诗人一百五十三家七言诗句一千八十二联,乃今存最早的汉诗诗句专门选本。《和汉朗咏集》

收录适宜朗咏的中日诗句八百零四则,其中入选唐代诗人二十九人、诗二百三十二首。

日本政府中止派遣遣唐使,这一中日交流史上划时代的“结束”,时在宇多天皇宽平年间。中国文化的“圆熟黄金期”、日本“国风”的最“暗黑”时期也是在宽平年间,两者绝非巧合。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有必要给这一代作一个总结。宽平前后,正值此时。于是,在汉风鼎盛的氛围中,在帝王的倡导下,跟上述的各类著述一样,出现了一部“敕编”的,“日本最早”的,收录宏富的、带有归纳、总结、集成、网罗性质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应运而生,是众多的汉文著述中的一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五百年汉籍东传、文明东传的成功总结。

无独有偶,延喜十四年(913),醍醐天皇下敕东大寺,令编撰佛教综合目录,僧圆超等集录当时佛家华严、天台、三论、法相、律五宗章疏,编成《诸宗章疏》。此目与集汉籍之大成的《日本国见在书目》相映成辉,其背景也在于此。

回顾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的“海上丝路”,看到这些在大洋彼岸所呈现的中华文明的万千气象,令人叹为观止。

(作者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研究院教授)